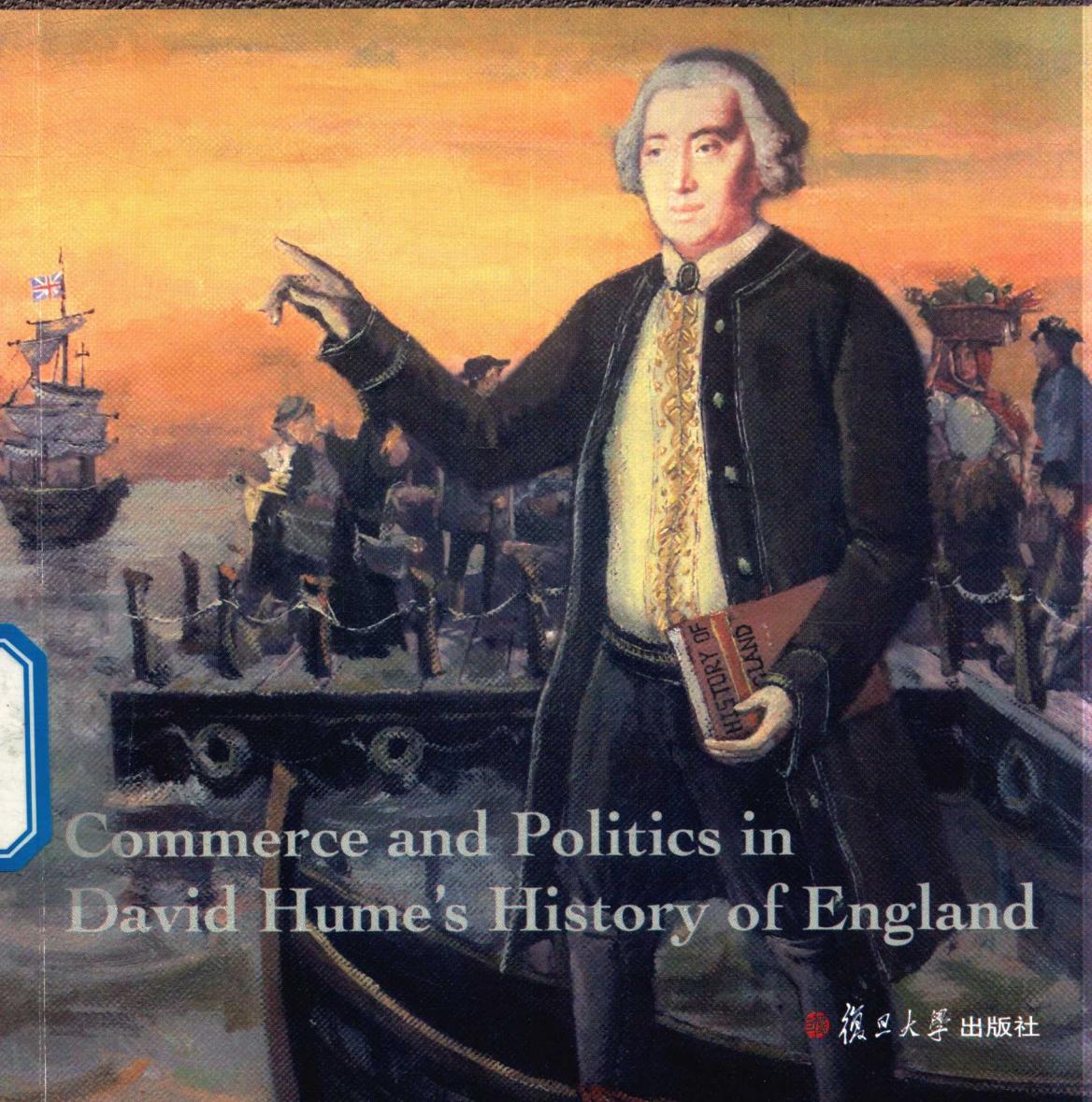


魏佳著

# 贸易与政治： 解读大卫·休谟的《英国史》



Commerce and Politics in  
David Hume's History of England

復旦大學出版社

Commerce and Politics in  
David Hume's History of England

# 贸易与政治：

## 解读大卫·休谟的《英国史》

魏 佳 著

復旦大學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贸易与政治：解读大卫·休谟的《英国史》/魏佳著/译.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8. 6  
书名原文：Commerce and Modern Politics in David Hume's History of England  
ISBN 978-7-309-13670-8

I. 贸… II. 魏… III. 英国-历史-研究 IV. K561. 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93462 号

COMMERCE AND POLITICS IN HUME'S HISTORY OF ENGLAND

By Jia Wei

ISBN: 978-1-78327-187-0

Copyright© 2017 BY JIA WEI

Copyright© 2017 BY The Boydell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Except as permitted under current legislation no part of this work may be photocopied, stored in a retrieval system, published, performed in public, adapted, broadcast, transmitted, recorded or reproduc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without the prior permission of the copyright owner.

版权所有。除了现行法律允许的情况，未经版权人事先书面许可，本出版物的任何部分不得以任何方式或途径被影印、储存于检索系统、发行、公开发表、改编、广播、传播、录制或复制。  
This authorized Chinese(Simplified Characters) edition is published by Fudan University Press Co., Ltd. according to the arrangement with Boydell & Brewer Ltd.

本书经 Boydell & Brewer Ltd. 授权，由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中文简体版。

Copyright© 2018 by Fudan University Press Co., Ltd.

上海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09-2018-119 号

贸易与政治：解读大卫·休谟的《英国史》

魏 佳 著

责任编辑/孙程姣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200433

网址: 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门市零售: 86-21-65642857 团体订购: 86-21-65118853

外埠邮购: 86-21-65109143

上海市崇明县裕安印刷厂

开本 787 × 960 1/16 印张 14 字数 179 千

2018 年 6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9-13670-8/K · 657

定价: 58.00 元

---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致 谢

本书修改自我的博士毕业论文,得以在英国和中国出版要感谢很多人的帮助。我首先感谢我的两位博士生导师: Istvan Hont 博士(已故) 和 Sylvana Tomaselli 小姐。Hont 博士是我成长中一位无法替代的精神导师,我将永远缅怀他独特的思考方式和人格魅力。很遗憾我现在无法把这本书送给他,但是希望本书能给他的遗孀 Anna Hont 夫人带来慰藉。Tomaselli 小姐给我提供了最大可能的帮助,她独立且睿智,是我终生的楷模。我要感谢 Callum Barrell 博士、Roger Emerson 教授、Mark Goldie 教授、Karen O'Brien 教授、Nicholas Phillipson 教授、Stephen Taylor 教授、Mikko Tolonen 教授和 Felix Waldmann 博士对草稿的修改建议。本书由 Boydell & Brewer 出版社于 2017 年 3 月在英国出版发行,感谢复旦大学出版社的章永宏博士、孙程姣女士、戴文沁女士通过卓越的努力把本书带给中国的读者。

我对休谟的政治思想和英国历史的理解得益于以下学者: Doohwan Ahn 教授、Moritz Baumstark 博士、John Dunn 教授、Michael O'Brien 教授、Pasquale Pasquino 教授、Kate Peters 博士、Brendan Simms 教授和 Spyridon Tego 教授。此外,感谢 David Stasavage 教授对我在 2015 年春季在纽约大学的访问给予的大力支持。本书第二章的一部分作为一个专题在巴西贝里藏特市举办的第 40 届休谟年会上发布,感谢与会者提出的修改建议。本书第四章的一部分在《休谟研究》(*Hume Studies*) 第 40 卷 2 号刊发表,标题为“Maritime Trade as the Pivot of Foreign Policy in Hume's Stuart History”。我在

此对四位置名评论员表示感谢。

我要特别感谢 Ruth Körner 夫人，她在我英国求学期间帮我克服了英语写作上的种种困难，并给了我很多精神上的鼓励。我还要感谢默里·爱德华兹学院的辅导员 Elsa Strietman 夫人，在这所女子学院的生活经历是我一生中非常宝贵的财富。我要对以下图书馆的管理员表示感谢：剑桥大学图书馆、大英图书馆、Bodleian 图书馆、伦敦学院大学图书馆、Huntington 图书馆(San Marino, CA)和三一学院图书馆。另外，我要感谢华盛顿人文学科研究院(Institute for Humane Studies)给我提供的奖学金。以上的学术机构和学者不对本书负责，任何错误由本作者承担。

此书献给我的父母，他们对我无私的爱是我无法回报的。

魏 佳

2018 年 6 月

# 简 写

- 《散文集》 *Hume, Political Essays* (Knud Haakonssen, e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 《MPL 散文集》 *David Hume, Essays: Moral, Political and Literary* (E.F.Miller, ed., Liberty Fund, 1987)
- 《英国史》<sup>①</sup> *David Hume, The History of England, from the Invasion of Julius Caesar to the Revolution in 1688* (6 vols., Liberty Fund, 1983)
- 《书信》 *The Letters of David Hume* (J.Y.T. Greig, ed., 2 vol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 《新书信》 *New Letters of David Hume* (R. Klibansky and E.C. Mossner, ed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4)
- 《知名人物书信》 *Letters of Eminent Persons Addressed to David Hume* (J.E. Burton, ed., W. Blackwood and Sons, 1849)

---

① 本书中休谟的《英国历史：从尤利乌斯·恺撒入侵到 1688 革命(1754—1761)》共六卷，全书简称为《英国史》，前两卷简称为《中世纪史》，第三和第四卷简称为《都铎史》，第五和第六卷简称为《斯图尔特史》。页下注仅析出卷名和页码，例如，休谟，《英国史》，III, p.80。《英国史》的 Liberty Fund 版本删除了一些早前版本中的段落，本书在引用这些部分时使用最早出现的版本。除休谟本人的著作外，其他外文著作在页下注中都以原始作者名和书名标注，不翻译成中文。

# 目 录

## 1 / 绪 论

14 / 第一章 贸易成为“国家事务”

16 / 第一节 贸易社会

26 / 第二节 封建制度的衰落

35 / 第三节 航海贸易的推动力

45 / 第四节 中产阶层的兴起

## 51 / 第二章 都铎统治下的文明君主制

53 / 第一节 文明君主制

60 / 第二节 贵族的没落

70 / 第三节 宗教改革

79 / 第四节 都铎君主制面临的困境

## 89 / 第三章 宪法的自相矛盾

91 / 第一节 王室专款纠纷

104 / 第二节 公共财政问题

111 / 第三节 中央集权的公共财政体制的建立

123 / 第四章 航海贸易作为外交的中枢

125 / 第一节 战略定位

135 / 第二节 殖民扩张和航海贸易

146 / 第三节 对外交政策的探索

153 / 第四节 海军至上

161 / 第五章 受到威胁的公共自由

163 / 第一节 “关于一个完美共和国的想法”

172 / 第二节 民事自由的完善

180 / 第三节 实现公共自由的途径

188 / 第四节 1688 年革命

196 / 第五节 “威尔克斯与自由”事件

200 / 结论

206 / 主要参考文献

## 绪 论

你知道在英国帕那萨斯山上没有比历史学家更空缺的职位了。我们的历史学家无论是在写作风格,还是在判断力、公正性、小心谨慎方面都有所欠缺;即使是近期出现的历史学家拉庞(Paul de Rapin)在这些方面也是极度匮乏的。我在创作中模仿古(希腊)人,使我的作品非常简约。它分成三个适度大小的卷:第一卷到查尔斯一世之死结束,第二卷到(1688年)革命,第三卷只写到汉诺威家族即位,因为我对写当代史是心存恐惧的<sup>①</sup>。

休谟给约翰·克莱芬(John Clephane)的信,1753年1月

1770年8月,休谟给他的出版商威廉·斯特拉恩(William Strahan)的信中写道:“我相信这是一个极具有历史性的国家,而我们正处在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时代。”<sup>②</sup>他的《英国史》将作为这个时代的史学典范成为18世纪西方世界的畅销书之一<sup>③</sup>。他写作此书时,英国正处于一个关键的历史时期——七年战争(1756—1763)。经过几个世纪的积累,英国正经历着

① 此时休谟正在撰写第一卷的《斯图尔特史》,在写完第二卷的《斯图尔特史:从克伦威尔统治时期的共和国到1688年革命》后他改变了这个计划,回过头去写了《都铎史》和《中世纪史》。他从未发表该信中提到的第三卷。

② 休谟,《书信》,II, p.230。

③ Karen O'Brien, *Narratives of Enlightenment: Cosmopolitan History from Voltaire to Gibb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56–92.

快速的经济发展和政治变革，努力构建着一个横跨大西洋的贸易帝国<sup>①</sup>。与此同时，休谟所处的政治生态环境正处于一个两极分裂的状态，人们对英国社会、经济发展根源的认识也是“非黑即白”。休谟看到，以王室党和在野党意识形态为基础的两种极度偏颇的历史观已成为政治辩论的基调，而他则要从一个全新、公正的角度对英国历史的革命性发展作出诠释。

要全面解释休谟所处的政治环境和当时所有的政治思想学派需要一个极大的图书馆。但是，一般读者可能未必愿意深入了解那个遥远时代政治生态圈的细枝末节，而更愿意知道休谟怎么解释那些我们都已熟知且仍在影响当今世界的历史事件，如伊丽莎白一世怎样打败了菲利普二世的西班牙“无敌舰队”，查尔斯一世为什么被送上了绞首架。休谟的《英国史》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作为18世纪最敏锐的观察家之一，他解释了大英帝国的崛起，以及它独特的政治、经济、社会制度的历史根源。本书的重点是研究休谟的政治思想和政治经济学，它对理解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经济的深刻变化也有非常大的借鉴意义。中国读者尤其对本书会感兴趣，因为英国在18世纪成长为一个贸易帝国正映射了两个世纪后中国的崛起，这两个国家的发展都得益于15世纪末欧洲大航海的发现。应该说，中国现在所处的历史时代正是那个大航海时代的延伸，而如何在新的历史时期寻求新的机遇和发展需要我们理解这一切从何而来。

邓肯·福布斯(Duncan Forbes)的《休谟的哲学历史》是解读《英国史》的经典之作<sup>②</sup>。福布斯认为，休谟为当权政府提供了一个“正统辉格党历史”的替代品——“一个当权派历史：为后革命时代政权服务的政治责任理论在17世纪史实上的应用。”<sup>③</sup>但是，福布斯过度强调了休谟所处的政治环境，要求读者对18世纪中叶的英国政治现实非常了解，且

---

① John Brewer, *The Sinews of Power: War, Money and the English State 1688–1783*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pp.xiii–xxii.

② Duncan Forbes, *Hume's Philosophical Politic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5).

③ Ibid., p.264.

在某种程度上淡化了休谟作为一个历史学家的角色。

福布斯的著作《休谟的哲学历史》出版之后,一些学者对研究休谟史学观提出了新的见解<sup>①</sup>。波科克(J.G.A. Pocock)分析了 17 世纪封建史学家亨利·斯佩尔曼(Henry Spelman)、约翰·塞尔登(John Selden)和罗伯特·布莱迪(Robert Brady)对休谟的影响<sup>②</sup>。休·特雷弗-罗伯(Hugh Trevor-Roper)、尼古拉斯·菲利浦森(Nicholas Phillipson)、詹姆斯·摩尔(James Moore)、罗杰·爱默生(Roger Emerson)、唐纳德·利文斯顿(Donald Livingston)和莫里茨·包姆斯塔克(Moritz Baumstark)则强调了休谟鲜明的苏格兰背景<sup>③</sup>。菲利浦森把休谟同丹尼·笛福(Daniel Defoe)、约瑟夫·爱迪生(Joseph Addison)和理查德·斯蒂尔(Richard Steele)这些 18 世纪早期还处于萌芽中的咖啡馆

- ① 例如, Victor G. Wexler, “David Hume’s Discovery of a New Science of Historical Thought”, *Eighteenth Century Studies* 10 (1976–7), pp.185–203; Eugene F. Miller, “Hume on Liberty in the Successive English Constitutions”, in N. Capaldi and D. Livingston, eds., *Liberty in Hume’s History of England* (Springer, 1990), pp.53–103。
- ② J.G.A. Pocock, *Barbarism and Religion* (5 vol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11), II, pp.163–257; J.G.A. Pocock, *The Ancient Constitution and the Feudal Law: A Study of English Historical Thought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
- ③ Hugh Trevor-Roper, *History and the Enlightenment*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0); Nicholas Phillipson, *David Hume: The Philosopher as Historian* (Penguin, 2011); James Moore, “Hume’s Political Science and the Classical Republican Tradition”, *Canad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1977, 10, pp.809–39; Donald W. Livingston, *Hume’s Philosophy of Common Lif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4); Moritz Baumstark, *David Hume: The Making of a Philosophical Historian: A Reconsideration* (unpublished D. Phil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Edinburgh, 2007); Roger L. Emerson, *Essays on David Hume, Medical Men and the Scottish Enlightenment: Industry, Knowledge and Humanity* (Routledge, 2009).

关于休谟的学术生平,可参考 Henry Grey Graham, *Scottish Men of Letters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A. and C. Black, 1908), pp.35–59; Carey M. Roberts, “David Hume”, in E. J. Jenkins, ed., *Eighteenth-Century British Historians* (Thomson Gale, 2007), pp.193–205。

文化的拥护者们联系起来，把休谟的历史解读为一个消除当代政治文化中的狂热和偏见的有益尝试。

尽管以上研究体现了休谟时代政治生态文化对理解《英国史》的重要性，还未有学者通过他对市场经济的观点研究其政治思想史的理论框架。对于休谟作为一个经济学家在贸易方面的论述很多，但是他对一系列相关政策问题的阐释还没有被广泛研究。例如，他如何解释贸易的兴起导致政府权威和公民自由需要重新被协调，以及为什么必须有效地协调两者以促进英国经贸和政治利益。诚然，休谟的苏格兰背景为他的《英国史》带来了情感方面的深度，尤其体现在他对苏格兰玛丽女王的充满感情的人物描写上。但是，休谟的叙事更多地体现了一个18世纪现代欧洲学者特有的国际化视野。尽管这也是他的苏格兰朋友所坚定不移支持的，他的《英国史》并未使他成为苏格兰思想文化界的代言人。毕竟，是英国[而非其他国家]在迈向现代贸易社会中成了欧洲的典型，而休谟的故乡苏格兰在理解和接受贸易的逻辑这一过程中则稍显迟钝。

笔者认为，休谟的史学观应该更多地从18世纪欧洲社会的背景来解读，而不是从当时苏格兰的背景来分析。休谟采用了与他的苏格兰朋友们大相径庭的史学方法。他同时代的苏格兰学者或多或少地相信人类社会必然发生阶段性的进步，这也是18世纪苏格兰宏观叙事史中的一个重要主题。休谟则认为机遇在人类历史演变中的作用太大，以至于宏观人类史的基础不可能是纯粹形而上的。在完成整个《英国史》时，他总结了历史无法预见的后果：英国宪政中“权力的均衡一直在几个社会阶层中剧烈地变化着；这个政体[即英国政府]经历了所有人类团体和机构所共同的易变性”。显然，休谟对历史变迁和人的主观意志之间的相互作用比他的苏格兰朋友认识得更为深刻。

近年来对《英国史》的解读大多偏重休谟在撰写此书时的学术和政治背景，对他关于现代英国史独特的叙述方式及对读者的启蒙意义少之又少。本书将《英国史》放在一个全新的视角来解读，阐释休谟作为一个

政治思想家、一个历史学家和一个政治经济学家这三个角色之间的关系。

具体而言,本书重点关注休谟对宏观社会、经济制度变化的阐述,探讨他如何用一种创新的方式对历史因果作出解释。这主要体现在对休谟《英国史》三个方面的论述:一是他对现代性的拥护,研究他如何把这一点融入对英国成为一个贸易国的历史叙事中;二是他对航海贸易的强调,这主要是在贸易革命的背景下展开的;三是他关于平衡公民自由和政府权威关系的主张。

休谟的史学出发点可以通过研究以下这个问题来理解:假定人类存在普遍特性,那么如何理解英国(或任何一个国家)塑造出自身独特的定位?休谟认为,人的本质在于其众多的激情和欲望,而这些动机决定了政府执政的准则和整个社会的构造。尽管休谟没有像查理-路易·孟德斯鸠(Charles-Louis de Secondat, Baron de La Brède et de Montesquieu)那样把气候作为影响国民性格的原因之一,但他在史学方法论方面非常接近后者<sup>①</sup>。18世纪法国史学对休谟的影响可以追溯到休谟早年在法国拉弗莱什(La Flèche)耶稣会士学院的成长岁月,一些重要的历史学者曾在那里著书立传<sup>②</sup>。同伏尔泰(Voltaire)、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和威廉·罗伯特森(William Robertson)等18世纪哲学历史学家一样,休谟从孟德斯鸠那里学到了一个国家的精神(esprit)是怎样由法律的执行、政府的形式以及习俗来定

<sup>①</sup> Charles de Secondat, baron de Montesquieu, *The Spirit of the Law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edited by A. M. Cohler, B. C. Miller and H. S. Stone. 关于孟德斯鸠对休谟的影响,参见 Roger B. Oake, “Montesquieu and Hume”, *Modern Language Quarterly*, 1941, 2, pp.25–41; Hugh Trevor-Roper, *History and the Enlightenment*, pp.4–6; J.G.A.Pocock, *Barbarism and Religion*, II, pp.258–61。

<sup>②</sup> William Hunt, “David Hume: Influences on his Historical Work”, in A. W. Ward and A. R. Waller, 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English Literature* (18 vol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07–21), X, p.282.

义的<sup>①</sup>。

1759年，休谟建议罗伯特森用古希腊史学家的方法描述现代生活，这种方法并不“对人物的行为作非常细致的描写”，而是“通过对重要历史人物非同寻常的言行和轶事刻画他们的生活和探险”<sup>②</sup>。这其实是休谟自己采用的史学叙事方法。吉本观察到，休谟的《英国史》有一种“安静的哲学”和“自然且无法模仿的美”，与罗伯特森的“完美的结构、紧张的语言和措辞巧妙的段落”形成了鲜明的对照<sup>③</sup>。尽管他们在关注点、

---

① Voltaire, *Essai sur l'Histoire Générale, et sur les Moeurs et l'Esprit des Nations, depuis Charlemagne jusqu'à nos jours*, printed by F. M. Arouet de Voltaire, Geneva, 1761 – 3; William Robertson, *The History of Scotland during the Reigns of Queen Mary and of King James VI till his Accession to the Crown of England* (2 vols., Printed by James Williams, Dublin, 1778), I, pp. 15–17. 关于另外一个对休谟在此方面的影响的来源，参考 John P. Wright, “Butler and Hume on Habit and Moral Character”, in M. A. Stewart and J. P. Wright, eds., *Hume and Hume's Connexions*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 105 – 18。关于休谟的苏格兰学术背景，可参考 Gladys Bryson, *Man and Society: The Scottish Inquiry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45), pp.78–113; Frank E. Manuel, “Edward Gibbon: Historien-Philosophe”, *Daedalus*, 1976, 105, pp. 231 – 45; Paul Cartledge, “The Enlightened Historiography of Edward Gibbon, Esq.: A Bicentennial Celebration”, *The Maynooth Review*, 1977, 3, pp.67–93; Roger L. Emerson, *Essays on David Hume, Medical Men and the Scottish Enlightenment*, pp.119–20; Hugh Trevor-Roper, *History and the Enlightenment*, pp.4–16; James Harris, *Hume's Intellectual Development: an Overview* (University of Edinburgh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ies in the Humanities, 2011), pp.19–23。

② 休谟于1759年给威廉·罗伯特森(William Robertson)的信，参见休谟，《书信》，I, p.316。Giovanna Ceserani, “Modern Histories of Ancient Greece: Genealogies, Contexts, and Eighteenth Century Narrative Historiography”, in A. Lianeri, ed., *The Western Time of Ancient History: Historiographical Encounters with the Greek and Roman Pas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pp.138–55.

③ 引自 James Westfall Thompson, *A History of Historical Writing: The Eighteenth and Nineteenth Centuries* (2 vols., Macmillan, 1942), II, (转下页)

风格和兴趣上非常不同,但这些哲学历史学家们都认为文化传统和民族精神是历史的驱动力,因为人的认知和观念正是通过它们形成的<sup>①</sup>。

休谟最初的计划是撰写一部从斯图尔特年代到汉诺威登基的英国史,而不是一部英国文明史,因为他“对写一部纵跨 1 700 年历史的想法感到恐惧”。但是,在 1757 年出版了两卷《斯图尔特史》后他并没有继续写下去,而是追溯了斯图尔特王朝的上一个朝代——都铎王朝,先后完成了《都铎史》和《中世纪史》。理查德·赫德(Richard Hurd)——休谟同时代的作家——这样嘲讽休谟独特的史学方式:“在成功地创造了绝对能量后,他[休谟]认为有必要反其道而行之,通过倒着写作来唤醒那些令人恐惧的幽灵(如同女巫们一样)。”<sup>②</sup>休谟的初衷和他实际完成作品在范围和内容上的差异显示了他的史学观经历了深刻的变化。他实际经历的历史创作过程表明他的研究兴趣转移到了 17 世纪中期英国宪政危机的根源,而非这个危机对 18 世纪政治生态的影响。因此,休谟在《英国史》中试图解决的问题是:英国如何发展出其独特的自由?换言之,英国人所争取到的民事、宗教和经济自由的历史根源是什么?

---

(接上页)pp.71, 80。关于威廉·罗伯特森的史学方法,参考 D. J. Womersley, “The Historical Writings of William Robertson”,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1986, 47, pp.497–506。

- ① 关于休谟在此方面的哲学思考有非常多的文献,可参考 J. B. Black, *The Art of History: A Study of Four Great Historians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 (Methuen & Co., 1965), pp.1–28; Daniele Francesconi, “William Robertson on Historical and Unintended Consequences”, *Cromohs-Cyber Review of Modern Historiography*, 1999, 4, pp.1–18; John P. Wright, “Ideas of Habit and Custom in Early Modern Philosophy”, *Journal of the British Society for Phenomenology*, 2011, 42, pp.24–7。
- ② Ernest Campbell Mossner, *The Life of David Hume*, 2nd edn (Clarendon Press, 1980), p.302; Richard Hurd, *Moral and Political Dialogues: Being the Substance of Several Conversations between Divers Eminent Persons of the Past and Present Age*, Digested by the Parties Themselves, and Now first Published from the Original MSS with Critical and Explanatory Notes by the Editor, London, 1759, p.304.

从18世纪中叶的角度来看，英国人是全世界唯一一个可以骄傲地宣称自己是自由的民族。他们认为这些政治、经济和社会自由归功于“古代宪法”，而“古代宪法”则是他们一千多年前的撒克逊祖先设计并世世代代传承下来的。休谟在《英国史》中追溯了“古代宪法”模棱两可的本质，指出所谓的“古代宪法”真正起源于派系斗争。通过这种方法，他揭示了“古代宪法”的自相矛盾，以及现代英国崇尚的自由与古代和中世纪英国政府的运行准则无法相容这个事实<sup>①</sup>。

作为一个哲学历史学家，休谟不仅要构建一个英国上千年间如何形成自身的独特定位和视角的宏观叙事史，更重要的是要从一个批判的角度得出英国怎样形成符合自身发展定位的结论，来解决当代政治层面的多元挑战。他描述了英国通往贸易财富的独特路径，着重强调了英国在发展后封建制度方面的失败，以及这个失败背后的历史原因。他认为英国根深蒂固的辉格党思维方式不但过时而且危险，需要用一个全新的史学和政治认知加以矫正<sup>②</sup>。

休谟看到，英国人的狭隘使其在18世纪的欧洲政治博弈中保护来之不易的自由非常困难。他需要说服他的英国读者，英国之所以能够构建一个跨大西洋贸易帝国并取得如此宽泛的现代自由，靠的不是撒克逊祖先传下来的“古代宪法”而是欧洲遗产。具体而言，15世纪克里斯托弗·哥伦布(Christopher Columbus)和瓦斯科·达·伽马(Vasco da Gama)的航海大发现及由其引发的贸易给英国带来了一种由商业精神主导的自由，使其从一个农业国逐渐转变为贸易国。这个经济层面的变

① 波科克的研究揭示了休谟借鉴了很多17世纪英国封建史学家们的观点，尤其是亨利·斯佩尔曼(Henry Spelman)、约翰·塞尔登(John Selden)和罗伯特·布莱迪(Robert Brady)。参考J.G.A. Pocock, *The Ancient Constitution and the Feudal Law: A Study of English Historical Thought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 J.G.A. Pocock, *Barbarism and Religion* (5 vol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11), II, pp.163–257。

② Herbert Butterfield, *The Whig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 (W. W. Norton & Company, 1965).

化把国家的权力从精英地主阶层转到中产阶层(即“民众”)手中,从乡下转移到城市,从逐渐入不敷出的王室转移到日益强大的议会。

这是伊斯文·洪特(Istvan Hont)所著的《贸易的激情》(*Jealousy of Trade*, 2012)中的一个重要主题<sup>①</sup>。尽管洪特更多关注的是休谟的《MPL 散文集》和《散文集》,他的作品为研究休谟的《英国史》提供了一个理论框架。本书继续深入洪特博士的研究,指出要全面理解休谟在《英国史》中对自由的论述,需要掌握他怎样解释航海贸易对政治所起的变革性作用。休谟认为,贸易的兴起导致了封建制的灭亡,使得封建制最终被法制所取代。全新的贸易时代提升了对个体生命和私有财产实施法律保护的需求,把封建时代持续的战争和无政府状态替换为以法治国的现代政府<sup>②</sup>。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英国的自由归根于欧洲的航海发现以及之后的航海贸易。

本书综合了主题和编年的史学研究方法,起始于休谟的《中世纪史》,然后分别研究他的《都铎史》和《斯图尔特史》。这不同于其他休谟学者,如福布斯、波科克和菲利浦森,采用的纯粹编年方法,即按照休谟实际写作的顺序展开对他思想的研究。读者会在阅读本书中体会到,休谟关于贸易和现代政治的逻辑最适合通过英国宪法经历的几个阶段来理解。本书同时运用了编年方法,即通过休谟理论思想逐渐成熟的过程解读他在经济和欧洲政治的各个方面的论述,每章都跨越了数十年,从 17 世纪 40 年代开始一直到休谟去世前对《英国史》的修正。

休谟创作《英国史》的一个重要目标是抵消他那个年代的政党偏见,

<sup>①</sup> Istvan Hont, *Jealousy of Trade: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and the Nation-State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pp.325–53; Istvan Hont, “Commercial Society and Political Theory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The Problem of Authority in David Hume and Adam Smith”, in W. Melching and W. Velema, eds., *Main Trends in Cultural History: Ten Essays* (Rodopi, 1994), pp.54–94.

<sup>②</sup> 休谟,《英国史》,V, p.557。